

日本的大学改革

——在美国化与市场化的中间

[日]天野郁夫 著 陈武元* 译

编者按: 本文是日本大学审议会委员、日本高教学会会长、国立学校财务中心教授天野郁夫先生应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的邀请,于1999年11月1日在该所所做的演讲报告。天野先生从历史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分析、探讨了日本大学如何从学习德国模式到二战后被迫学习美国模式,以及90年代主动学习美国模式的变化,重点介绍了日本大学近年来改革的最新动向。天野先生的演讲内容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本刊现予以全文登载,以飨读者。

一、美国模式的时代

现在是世界各国的大学进行改革的时代,日本的大学也不例外。在日本大学的历史进程中,90年代是作为改革力度最大的时期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

在这场世界性的大学改革中,美国的大学作为改革的理想模式,在国际上受到特别高的评价。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出现了研究者或留学生的国际性流动,而他们首选的目标便是美国的大学。研究者或留学生把他们在美国的经历带回自己的国家,在对本国的大学进行改革时,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美国的大学为模式。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的大学改革都是以大学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来进行,并非言过其实。

的确,美国的大学是优秀的。就研究而言,在美国集中了3/4以研究水平高而闻名的所谓“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在高级专业人才的培养方面,美国的研究生院(例如医学或工商管理)聚集了来自全世界的留学生。本科教育质量之高

也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各国政治、经济界领导人的许多子女正在规模较小的被称之为“自由教育大学”(liberal arts college)的私立大学里就读。

在提倡改革的时代,在想要改革什么、怎么改革的时候,模仿成功的范例是极其自然的选择。世界上的大学改革以“美国化”来进行,美国的大学被视为大学改革的模式,从模仿或学习意义上说有其合理性。但是,在以美国大学为模式进行改革时,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那就是美国大学的特殊性,尤其是与国家(政府)或社会的关系的特殊性。

二、欧洲大学与美国大学

众所周知,大学最早诞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在欧洲,大学最先在天主教会,近代以后在国家的庇护下发展起来。具有中世纪传统的欧洲大学是独立于社会的机构,以人文、神学、法学、医学等传统学科为主,是教学与科研的场所,到18世纪时与真正的工业化还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工业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是在大学以外的教育机构接受培训,大学

* 厦门大学高教所副教授(厦门 361005)

是培养学者、中学教师、官吏以及像医生、律师这样的传统的高级专业人才 (Profession) 的场所。同时,对设立大学的认可权限由国家控制。

事实上,欧洲各国的大学都是国立的,直至今日私立大学的设立被认为是一种特例。大学办学所需要的资金几乎全靠国家,学生上大学不必交纳学费。被称为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全是按照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准设立,保持同样的质量和水平来运作。这可以说是欧洲大学自中世纪以来的传统。

摆脱历史或传统来到新大陆的人们建立了国家——美国,但美国的大学与欧洲各国的大学在性质上有极为显著的不同之处。在美国,大学首先是由教会资助设立的。但是,与天主教教会不同,新教派(基督教)的教会规模小,也没有财产。大学是靠信徒们的捐赠设立的,规模很小,属于私立大学(College),它弱小到无法与欧洲大学(University)相比,不是以研究而是以自由教育为目的的学校。

但是,这种与中世纪以来的历史或传统无缘的、弱小的、还不能称作大学的“大学”却有欧洲大学所没有的更大的“自由”。即创办大学或创办什么样的大学是自由的。与欧洲不同,美国大学的历史是从设立与国家没有关系的私立大学开始的。

从19世纪末期以来,美国的大学总算达到了与欧洲并驾齐驱的水平。当时是德国大学的全盛时期,世界各国的许多学者或留学生都流向德国,美国也一样。毕业于只重视人格培养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的、规模小的私立大学的美国青年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的大学首次接受到高水平的专业教育,才知道学术研究的严格。他们回国后,开始努力把美国的大学改革成为与欧洲大学一样作为高水平专业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场所。

作为美国新传统的“自由教育”大学,仍在大学中保留以前的“自由教育”的部分,在它的外部或上部建立了两个研究生院:即一个是作为学术研究和培养大学教师及研究人员的“研究生院”(graduate school),另一个是为了培养高级专业人才的“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这是他们创造出来的独特的美国大学形态(American university)。这两个

研究生院无疑是欧洲见不到的、美国大学的独特“发明”。

三、自由与竞争

这种大学与研究生院、专业学院三者一体型的大学所需的资金,不是来自国家,而是来自民间,特别是大资本家和大富翁们。进入19世纪,作为真正工业化的结果出现的美国大资本家和大富翁们,一方面是由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另一方面是作为税收对策的手段,把巨额的资金捐给私立大学。于是,贫困弱小的私立大学(College)终于发展成为与国家支撑的欧洲大学并驾齐驱的一流大学(University)。

19世纪后半期也是美国纷纷设立州立大学的时期。美国是联邦国家。在教育方面,联邦政府拥有的权力极其有限,没有一所国立大学。联邦的50个州各自都有自己的教育制度,因而也就有高等(大学)教育制度。建立这种独特的高等教育制度和设立州立大学始于19世纪后半期。处在各州公立教育制度顶点的州立大学被要求是为了纳税人(州民)的、或对州民有用的大学。因此,与私立大学不同,只要是州内高中毕业生,都可以入学,学费全免,而且本科教育内容必须比“自由教育”更重视实用性和应用性。初期创办的州立大学几乎都是农科和工科的专业教育机构。也就是说,州立大学是作为对工业化有用的、面向社会开放的大学而设立的。

这样的历史创造出了与欧洲完全不同的、自由竞争的、富有多样性与弹性的大学制度。它也可以说是极为适应重视自由与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学制度。美国的资本主义与大学携手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在美国的资本主义获得空前繁荣的今天,即使将美国的大学视作辉煌的理想的模式,丝毫也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

关于美国大学的话题或许过长了。但是,先了解一下美国大学的独特性,在思考日本的大学(也是各国的大学)现在面临的改革课题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日本(各国的)大学以及以各种各

样的方式受到美国大学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现在还在持续着。

进一步说,是因为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代表马丁·特罗(Martin Trow)的如下警告:“我们有必要事先充分知道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里有着特定历史的、结构性的特征。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可能会犯把美国的特殊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这样的重大错误。美国的经验或许值得学习,但是很有限。同时也存在着从美国经验的不适当结论中学到错误的经验的危险性”。上述警告,不仅日本,其他国家也是值得听的。

四、日本与德国模式

二战后日本大学在学制改革过程中受美国的影响最大,也最直接。1945年日本战败,美国占领军作为废除军国主义与建设民主主义社会的手段,要求日本对教育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并把民主化作为美国教育制度的精髓推广。美国占领军要求日本从1947年至1949年的短时期内,对包括大学在内的一切教育机构之教育目的与内容以及组织结构、管理运行机制进行全面的改革。

二战前的日本教育制度受欧洲尤其是德国的影响很大,这与1868年明治维新后出现的天皇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体制和当时的德国国家体制具有共同点有关。从小学至大学,教育基本上作为培养为国家(天皇)服务的人并对国家负责的工具,因而由中央集权统一管理。大学更是被当作满足国家需要的“国家的大学”。阐述天皇对教育见解的“教育敕语”,作为表达教育的基本理念而广受重视,日本最早的大学——东京大学被命名为“帝国大学”,便是这种教育基本理念的象征。

但是,与此同时,日本的大学有德国所见不到的两个特征:(1)在帝国大学设立工科和农科类的应用性、实用性的学部。这意味着与欧洲不同,日本大学放弃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以推进工业化为目的,追赶发达国家的“赶超”(catch up)型大学。(2)存在大量的私立大学,尽管教育是国家的责任,但由于

政府缺少必要的资金来设立能满足近代化起步时对大量人才的需要或升学需要的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于是不得不允许设立私立大学。

这两点都是当时德国见不到的,日本大学或高等教育的特征。这两点也是与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国高等教育具有共同的特征。二战后,日本的大学制度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德国模式转变成美国模式,不能忽略这种共同性。

但是,与此同时,不可忽略的是这种共同性,它毕竟是表面的东西。与美国州立大学不同,日本的国立大学是“为国家”的,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的大学,私立大学也是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下的。不仅如此,日本还缺少基督教博爱的传统,由于工业化起点较迟,也没有产生出能捐赠巨资的大资本家和大富翁,因而私立大学只能依靠学生交纳学费。所谓“一流大学”中的大多数是私立大学的美国与以国立大学为主的日本之不同点,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两国大学制度的根本性质的不同。

五、向美国模式转变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过的那样,美国占领军要求把这种基本上是德国模式,但加上日本特性的大学制度强行转变成美国式的大学制度。马丁·特罗所警告的无视历史或传统的不同恰恰在40年代的日本被强制进行。

结果,50年代初期,日本的新大学制度从表面上看具有与美国的大学制度极其相近的形式和结构。二战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是由教育年限和所起作用各不相同的多样化的学校所构成,例如,帝国大学与其他大学、高等学校、农工商实业专门学校、专门学校、师范学校等,这种高等教育制度通过二战后的改革,完全改变成仅由4年制大学和2年制短期大学构成的平等而又单一的制度。“为国家”的大学变成“为国民”的大学,政府对包括私立大学在内的大学的管理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了。学部和研究生院的制度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本科阶段的教育与美国一样,重视培养人格的“自由”教育和“基础性”的专业教育,高水平的专业教育则由研究生院来承担。

但是,向美国模式转变却没有超越美国模式。虽

说国家管理大学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弱,但在日本并没有产生出像美国那样分权的大学制度,国家仍然拥有对大学设立的认可与监督权力。美国占领军的构想是除一部分国立大学移交府、县管理外,大部分国立大学应变成与州立大学一样的大学。但由于大学方面的强烈反对,这种构想以失败告终。在因战败而导致贫困的日本社会里,没有资本家和大富翁向办学自由度日益增大的私立大学提供资金。美国大学制度的最大特征——多元化、自由竞争和以此为基础的多样性、弹性以及对社会的开放性,这些对日本的新大学制度来说都是无缘的东西。

不仅如此,日本的大学教授们长期以来以德国式的大学为理想模式,而且实际上均以德国大学为留学对象国,学习和研究德国式的学问,他们还没有充分理解美国式大学的理念。对他们来说,大学应是远离社会,拥有“自治”的特权,有志于学问的人们享有科研与教学的“自由”的“象牙塔”(ivory tower)像支撑美国大学制度那样的向社会开放,为市民、为社会的教学与科研的理念没能为日本的大学教授们所理解。

六、大众化与对改革的要求

尽管日本大学教授们有这样的大学观,但是作为制度改革的结果,日本的高等教育民主化了,教育机会均等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大学向求学者敞开大门。高等教育入学率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以及随后的高速发展而开始急剧上升,从18岁人口比来看,大学、短大的入学率从1960年的10%上升到1970年的23.6%,1980年的37.4%。日本快速地实现了马丁·特罗所说的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的转移,其高等教育“大众化”仅次于美国。特罗指出,“入学率15%是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转移的指标,超过这个比率,学生的意识和价值观将会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要求改革大学教育的形态、组织结构以及管理运行机制的压力将日益增强”。同时他还谈到,“变化最慢的是大学教授们的意识和价值观,它是大学改革的最大障碍”。在“大众化”过程中,日本大学的经验也正是由学生与大学教授们之间的价值观的不同而引起矛盾和对立,最终表现为1970年前后爆发激烈的学生运动。

1970年前后是二战后首次真正的教育改革,是

大学改革形势高涨的时期。文部大臣的咨询机构——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咨询报告要求对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与文部省尖锐对立的日本教职员工会也提出其独特的改革设想。OECD派来日本的教育考察团发表报告书强调教育改革的重要性也是这个时期。这些咨询报告和报告书共同指出大学面临的问题与改革的重要性。尤其是OECD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强烈批评日本大学教育制度缺乏自由竞争、僵化而又整齐划一,从国际上看在质量方面还不能说已处在高水平上,因而在日本社会引起强烈反响。

尽管来自包括学生在内,以及大学内外、国内外的强烈批评,大学还是不想改革,不,没法改革。因为大学,尤其是大学教授依然“保守”、消极地对待改革,政府也没有强行改革的积极性和权力。

七、从临时教育审议会到大学审议会

大学改革高潮的到来是此后近20年,即进入90年代后。创造此契机的是1984年,当时的自民党中曾根政权设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中曾根政权与英国的撒切尔政权、美国的里根政权一样,主张新保守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提出放宽政府的控制和引进自由竞争,把激活经济作为最大的政治课题。

其背景是国际经济竞争的日趋激化和日本经济的低迷。60年代以来,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被称之为“日本第一”的日本经济进入80年代后却突然开始急剧下降。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府对产业或企业的控制与保护,以及在作为发展动力的尖端科技竞争上落后。于是,放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与自由竞争,推进尖端科技研究便成为中曾根政权提出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为了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甚至在尖端科技竞争中取得胜利,不言而喻,激活大学的教学科研和提高水平是不可或缺的。临教审的教育改革的焦点之一,理所当然只能是面向大学。因此,讨论中心就是放宽政府(文部省)对大学的种种控制。

正如70年代初OECD教育考察团的报告书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在美国占领期间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日本的大学与欧洲各国,尤其是美国相比

仍被置于极其严格的政府控制之下。控制同时意味着庇护。政府的控制与庇护妨碍了大学之间的自由竞争,它使弹性的、开放的系统无法形成,妨碍了教学科研水平的提高,这是临教审做出的诊断。为了根据这种诊断来放宽政府控制,建立更自由而又竞争的系统,临教审要求设立集中讨论大学改革问题的独立审议会——大学审议会。

1987年设立在大学审议会首先提出重新修订《大学设置基准》。在日本,大学不论国、公、私立,都必须按照文部省制度的《大学设置基准》设立,并接受认定和管理。“放宽控制”首先就必须从重新修订控制之源的《设置基准》开始做起。

设置基准不仅详细规定了每生的校舍面积、图书册数和师生比等所谓大学的“硬件”(hard)部分,而且连学部学科的名称、课程设置等这种“软件”(soft)部分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在1991年的咨询报告中,大学审议会提出使以课程设置为中心的“软件”部件大幅度“自由化”。

日本的大学自创立以来,向德国大学学习,采用专业学部制,学生通过文学部、法学部、工学部等各部的学力考试被选拔入学,通过各个学部设置的课程接受教育。教授会以学部为单位组建。但是,二战后,向美国大学学习的改革结果,学生接受专业教育只是4年本科教育的后两年,前两年要求全部学生均必须接受公共(“基础(博雅)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内容,如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3大系列中设一定的科目,让学生修一定的学分,外语和保健体育作为必修科目等作了详细的规定。

1991年的大学审议会咨询报告事实上已废除了这种规定,怎样设置4年的本科教育全是各大学、学部的自由,与此同时,设什么样名称的学部、学科也是自由的。这意味着以19世纪以来的传统式学术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德国式大学的组织结构或课程,终于迎来了改革的时期。

八、向重视教学的大学转变

摆脱德国模式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快速地进行着。例如,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就是其中之一。根据德国式的大学理念,教学与科研不能分开。大学教授把自己研究的最尖端的学问传授给学生,学生通过实验或专题研讨也参与最尖端的研究工作。这就是19

世纪初在德国被确立下来的、日本大学以此为模式的教学与科研的关系。

这种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在大学入学率不到10%、即特罗所说的“精英阶段”姑且不谈,但在入学率接近40%的“大众化阶段”的大学时,只能是特殊情况下才会有关系。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基于这种现实情况,鲜明地提出了尽可能地把科研与教学的作用分开,科研放在研究生院,本科阶段重点放在教学的方针。

日本的大学教师十分重视科研,举世闻名。从90年代初对以14个国家的大学教师为对象的调查结果来看,日本大学教师重视科研胜过教学的比例为72%,仅次于荷兰,这个比例与接近最低位(37%)的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对重视科研的日本大学教授们来说,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以及由此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的确对他们冲击很大。

文部省不仅修订了大学设置基准,而且为了贯彻重视教学的方针,强烈要求大学在讲义概要的编写、教学法的改善、学生对教师上课的评价、信息教育以及外语教育的充实等方面应予以积极的努力。政府要求大学采取措施以更妥善地满足以前有显著不同的意识、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等这样的“大众化阶段”的学生们对教育的要求。

伴随着特罗教授所说的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的转移,从以科研为中心的大学向重视教学的大学的转变,是难以回避的要求。在适龄青年入学率还不到10%的时代,大学生是社会的“特权”集团,只要大学毕业,就基本上保证其自然地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地位。经过严格的学力评估而被选拔入学的学生,其智力和学习积极性都很高。

但是,随着入学率的提高,并向“大众化”阶段转移,学生们认为上大学是他们理所当然的“权利”。根据入学时的学力水平进行选拔的严格性丧失了,同时,学生的智力和学习积极性也都降低了。为了让只要不管就不学习的学生学习,要求大学必须千方百计想办法,大学教授们也不得不认真教学。

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最早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美国,原来就有建立人格培养,甚至是重视教学的规模小的大学这样的历史传统。而且,在大众化的过程中,钻研并发明了各种各样让学生们认真学习,让教授们认真教学的“激励机制”。日本文部省在修订大学设置基准的同时也要求大学引进产生于美国的这种教育“机制”。日本的大学自二战后的大学改

革起,经过半个世纪又迎来了“美国化”的季节。

九、美国化与市场机制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模式的大学制度最显著的特征在于自由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样性、弹性和开放性。要想真正地向美国模式转换,在以课程设置为中心的“教育”以外的领域里,还需要政府放宽控制、鼓励自由竞争。换句话说,必须把“市场主义”或“市场机制”引入大学的教学与科研,甚至是管理中来。90年代也是美国大学制度中特有的市场机制开始引入日本的时代。

在大学数或在在校生数私立均占3/4的日本,从二战前开始,大学之间就已经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但是,这种竞争更主要的是围绕获得更多的、或者是质量更高的学生的竞争,也就是以入学考试为中心的竞争。它与日本的大学是以国立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有很深的关系。由国家设立并管理的国立大学,在设施设备、教师、教学科研和社会评价等方面保持着高水平,但相互之间却为了获得更优秀的学生而展开激烈的竞争。入学考试的存在以及由此引起激烈的考试竞争是日本,尤其是国立大学的重要特征。

与此相对,私立大学由于工业化起点较迟,没能产生出向其提供所需资金的富翁和资本家,也不能指望国家在财政方面的资助。大部分私立大学只能尽可能多招收没能考上国立大学、学力相对较低的学生,靠他们支付的学费来支撑办学经费,以谋求未来的发展。

这种入学考试乃至以获得学生为中心的竞争,在二战后也基本上没变。不仅如此,教育“民主化”的结果,在入学申请者数急剧增加的过程中反而使考试竞争不断加剧。由于政府对国立大学规模的扩大持消极态度,入学申请者数的剧增,因而给私立大学的发展带来了有利的条件。提高学费、增加入学人数成为可能的私立大学,在办学经费上较为充裕,提高了设施设备和教学科研的水平,至少有一部分私立大学已发展到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的水平。

扩大自由竞争的政策最先以被视为大学之间竞争的重要手段——入学考试的“自由化”形式开始的。从80年代开始,文部省承认入学考试的科目数由大学自主决定,还允许以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名义,通过推荐入学制度等学力考试以外的方法选拔学

生。结果,以前基本上是5教科7科目的入学考试,连一流大学也减少到5教科5科目,而且最近还出现了只要求考1个科目的大学,甚至是完全免除学力考试的大学。入学考试的自由化已在大学领域产生一系列的弊病(例如入学者学力下降)进入90年代后,自由化也在其它领域开始了。

十、学生、教师、资金、知识

自由化的新课题为便于理解起见,我们可作以下归纳:即大学由学生、教师、筹措资金以及知识体系(课程)这四种资源,以各种方式组合这些资源,进行教学科研活动所构成。这四种资源中,随着学生入学选拔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课程设置的自由也得到了保证。剩下的就是与教师和资金有关的自由化。

首先关于教师方面。进入90年代后,日本的大学引进“任期制”。日本素以“终身雇佣、年功序列制”的国家而闻名,大学也不例外。教师一旦被聘为专职讲师,之后只要自己不提出调动,那么其在该大学工作到退休前则保证可晋升到副教授或教授。不少人毕业后在自己的母校当助教,并升上专职教师(这被称作“近亲繁殖”inbreeding)。

早已有人指出这种制度或惯例阻碍了教学科研,特别是科研的活泼化。为了谋求教师这一资源(特别是大学之间)的流动,在严格评价研究业绩的同时,有必要引进任期制。这是1996年大学审议会提出的改革策略。把这种市场机制引入教师这一资源的分配过程,不言而喻,是学习美国模式的。

其次关于资金方面。以前,国立大学全面依靠国家财政(税收),而私立大学则全面依靠学生(学生家庭)支付的学费。90年代改革的方向,一个是推进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另一个是把竞争机制引入资金的分配过程。结果,国立大学加速提高学费,引进企业或财团等民间资金,甚至转让专利。而私立大学则被鼓励引进外部资金或开展自己的事业收入。

关于资金的分配问题,竞争性分配政府研究资助金(科研费)的额度正在大幅度地增加。文部省给私立大学的资助金(占私立大学经常性收入的10%强)也不是一律平等,而是采取增加重点分配给各大学的额度的策略。资金来源越多元化,大学之间围绕获得资金的竞争就越激烈。这里也可以看到学习美国模式的意向。

十一、大学评估与管理运营

引进这种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另一面就是提高对大学教学科研工作评估的重要性。资源尤其是资金必须根据各个大学教学科研的质量与水平的高低来分配,结果使得资源的有效使用与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成为可能,这便是运用市场机制分配资金的基本想法。为了实现这样的想法,以某些形式来评估各个大学(甚至是每个教师)的教学科研水平并给予排序,无论如何也是必要的。资金来源多样化,因而资金分配越是竞争性的,那么被给资金的大学(和教师)便有向各个资金提供者报告或说明教学科研工作成果的责任(accountability)。这意味着大学不仅要自我检查、评估教学科研工作,对外公布自我检查与评估的结果(公开信息),而且还有必要进一步接受外部第三者的评估。

1991年修订的《大学设置基准》允许课程设置自由化,但却要求各大学要努力进行“自我检查与评估”,也正是这个目的。而且,文部省根据大学审议会的咨询报告,现正在筹备于2000年设立国立的“大学评估机构”。如果这个机构建立起来的话,那么所有的国立大学将在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3方面接受评估。大学或教师评估的最发达国家也只有美国。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关于引进市场机制与竞争的自由化问题,大学办学上的独立不可避免地要求加强和完善其管理运营机构。日本的大学具有很强的自治传统。校长、学部长原则上通过教授会成员的选举产生。作为办学主体设理事会的私立大学,不少情况下是由教职工选出的校长兼任理事长,学部长兼任理事。以传统自诩的私立一流大学几乎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种自治的传统或惯例是在政府或理事会与大学或大学教师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大学规模较小、而且很少迫于变化或改革的时代下,其作为大学管理运营机构有效地发挥了作用。但是,在大众化进一步发展,而且经济、社会以及学问本身也急剧地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被称之为“教授会自治”的这一传统,对大学的存在与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特别是为了在严酷的竞争环境中,充分且妥当地

筹措前面提到的学生、教师、资金以及知识体系这四种资源,使用这些资源后能取得得起来自外部评估的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的成果,无论如何都必须完善管理运营的组织结构,以谋求提高管理运营的效率。

1998年发表的大学审议会咨询报告《寻找21世纪的大学形态》,要求以强化大学校长的权力和完善审议机构为中心,加强大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运营机构应能够迅速地作出决策并根据决策开展工作。

在完善这种管理运营机构的指导方针下,1998年开始提出了国立大学“独立行政法人”化的构想。作为行政财政改革的一环,根据政府提出的这个构想,现在文部省直属的99所国立大学均被赋予独立的法人资格,在财权和人事权等方面被允许拥有以前不曾有的自主权。这可以说是政府放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控制,进而引进市场机制的最终措施。日本大学的美国化浪潮终于开始波及到国立大学的生存。

十二、共同性与独特性

关于美国化的这种动向,必须事先予以指出的是,随着其真正地开始波及到大学的基本结构或性质,重新确定日本大学的独特性或与美国大学的根本差异性也正在发挥作用。教师的任期制、资金来源的多样化以及大学评估或管理运营的合理化等越具体化,就越显露出日美两国大学的结构或性质的不同,单纯地把美国模式移植到日本的大学中来是困难的。

例如,经过激烈争论而引进的教师任期制,目前还只有极少数大学付诸实施。虽说引进外部资金是自由的,但实际上能够从企业或财团那儿获取资金的大学数和金额都是极其有限的。强化大学校长的权力,只要采取选举制,也就无法与采用理事会任命制的美国相提并论。如果考虑到大学的历史或传统以及其周遭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的不同,那么就不能不说要转变成与美国一样的既自由竞争又流动开放的系统是很困难的。

开头引用特罗教授对“会犯把美国的特殊制度

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这样的重大错误”的危险性的警告,完全符合现在日本的大学改革。

美国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另一位代表、原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把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共同可见的发展动向归纳成如下几点。

1. 经济低迷和大学规模扩大的结果,使得获取来自政府的财源越来越困难。

2. 大学和政府及产业的关系越紧密,就会越失去大学在学术上的独立。

3. 政府对大学的政策,从个别的“控制”变成“引导”,竞争主义的市场压力增强,大学逐渐市场化。

4. 这种“引导”从纯学术发展到应用研究、研究的应用与技术训练,又逐渐有很多的研究和技术训练在大学的外部进行,这是世界经济竞争激化的结果。

5. 各国政府还想积极地扩大大学教育的机会。

6. 其结果,在一般趋势上,大学会向大学之间的功能分化迈进,但另一方面,均等化的压力也仍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7. 针对这种变化,大学会逐渐强化并形成以校长为企业主体的企业特性。

8. 大学在资金来源方面,会逐渐提高对学生缴费的依赖程度,同时充实奖学金制度是不可或缺的。

9. 在课程方面,会逐渐重视基础数学与语言能力的培养,及有关世界各种文明的学习。

10. “人才外流”(brain drain),即有才能的人才的流动,不只是在国内,连国际间也逐渐激烈起来。

11. 就大学而言,已经不能视存活下去乃当然之事,因此不仅要关心将来的繁荣,也要关心存活之事。

12. 可是在大学内部,就整体而言,作为大学人的责任感低落,利害的分裂化正在增大。

十三、主体选择

这些一系列的变化是在克尔的国家——美国的大学中见到的最显著且最极端的事例,但同时却不同程度地在发达国家的大学中共同出现。如果概括其发展动向,可以说是“市场主义”,更严密地说是英美式市场主义对大学世界的浸透。这与英美资本主义逐渐充斥世界不无关系。被称之为“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这种动向,不论愿意与否,正在越过国界把所有的国家纳入市场经济的网络中,同时也正在迫使各国改变其各自的经济制度或习惯做法。大学世界现在出现的现象与此相同,日本只不过是典型事例中的一个。

正如在开头提到的留学生或研究者的流动中所见到的那样,各国的,尤其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research university)已经被纳入全球化的大学系统中,其质量与水平正在不断地接受人们的评判。不论愿意与否,变化正在以着实增加被纳入全球化网络的大学数,迫使各国的大学制度或每个大学应对这种来自外部压力的方式进行着。不仅如此,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简称IT)的快速发展在加速越过国界的大学系统的全球化方面正在发挥着作用。学生能够在日本大学的教室里听美国大学的课程,与美国大学教授直接交换对问题的看法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但与此同时,大学依然根深蒂固地扎根在各国的社会与文化的独特性之中。大学或大学制度的美国化以及统一成美国模式,除了经济因素外正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和困难。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美国化的压力的确难以回避。但是,如何理解这种压力,如何建立起既保留本国的文化与教育的传统,又有能力积极地参与全球化竞争的大学,是各国政府与大学的责任和选择的问题。

进入90年代后,正在进行的日本的大学改革在市场主义的美国化的强大压力下,被置于如何探索并确立日本式的大学形态这个充满困难的试验和摸索的旋涡之中。□